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三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責任編輯

谷 玉

中華文史論叢

第五十三輯

錢伯城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一分廠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1677-6

Z · 257 定價: 6.50 元

目 錄

[百年學術：回顧與思考]

- 中國近代國家學說的發展 李華興(1)
晚清翻譯界及新文學時期的外國
文學介紹(1898—1948) 王 勉(33)
民國以來研究《水經注》之總成績 陳橋驛(52)

[文史天地]

- 中國最早的物候曆月名——楚帛書月名
及神祇研究 劉信芳(75)
《長恨歌傳》新探 卞孝萱(108)
唐代宮人釋放問題初探 鄭華達(134)
馮夢龍研究獻芹 [美]馬泰來(157)

[古小說鉤沉]

- 唐白行簡《三夢記》考辨 方詩銘(168)
論《封神演義》的成書 徐朔方(185)

讀臺北版漢城奎章閣藏本《型世言》札記… 郭豫適(200)

[莊子發微]

《莊子·人間世》解歧 …………… 何善周(215)

[方言探源]

松江方言考 …………… 施藝存(244)

[著錄與版本]

瞿佑及其時代——日本內閣文庫所

藏瞿佑《樂全稿》探析 …………… 李 慶(258)

秋瑾作品源流考 …………… 陸 楓(288)

[學海遺珠]

釋《桃花扇》“扶頭卯酒”…………… 傅蔭強(310)

百年學術：回顧與思考

中國近代國家學說的發展

李華興

封建主義的國家制度和國家學說，以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直到 1840 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社會被迫地由中世紀向近代化轉變之後，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才發生動搖，甚至它的存在也發生了危機。

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學說在中國的傳播和封建主義國家學說在中國的沒落，是中國近代國家學說發展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將國家制度比作實體，那麼，作為觀念形態的國家學說則是它的靈魂。研究中國近代國家學說的發展，不僅要分析矛盾着的兩種國家學說的互相聯繫和互相轉化，而且要將實體和靈魂結合起來，即將國家制度的變革和人們的觀念更新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馬克思曾說：“一切發展，不管其內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

列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們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繫着。”^①本文試圖從基本的歷史事實出發，對中國近代國家學說的發展進行動態研究，探索這一過程依次發展的階段，揭示它的內在規律，並從新陳代謝的歷史反思中引出一些有益的啓示。

一 對封建國家制度的舊式批判和對西方國家 制度的朦朧嚮往(19世紀40—60年代)

歷代封建統治者，不管是“開明皇帝”還是“專制暴君”，都將“君權神授”、“皇權至上”奉爲天條。然而，這個觀念不打破，民主政治便無從談起。

明末清初，黃宗羲等人已對君主專制進行抨擊，指出：“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②清道光年間，在“避席畏聞文字獄”的黑暗歲月，龔自珍也對君主專制舉起了投槍。他將當時社會的卑劣和政治的腐敗，歸咎於封建國家的最高偶像——皇帝，尖銳地揭露，皇帝的各種舉措，都是爲了“箝塞天下之游士”^③，而在皇權專制主義的國家機構中，“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④。作爲地主階級改革派，龔自珍懷着煉石補天的赤膽忠心，期望道光皇帝能“更法”、“改圖”、“變功令”，甚至大聲警告：如果皇帝再不下決心改革，那麼“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⑤，局面將不可收拾。儘管對“山中之民”有多種解釋，但可以肯定，它是與“京師”相對立的一種政治力量。透過此類“異義可怪之論”可以看到，龔

自珍已經把君與民對立起來了。

龔自珍批判了舊的國家制度，卻又不知新的國家制度是什麼。如果說，龔自珍的舊式批判和改革方案不過是“藥方只販古時丹”，那麼，魏源的《海國圖志》（1842年初刻）已經具有最初的世界眼光和朦朧的近代意識了。

經過中英鴉片戰爭，魏源不僅從戰敗的奇耻大辱中，看到“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⑥，要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認為英法等國軍事力量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們有強大的工商業作後盾，主張在中國發展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而且朦朧地感到，夷人的國家制度也有比我們好的地方。在他看來，美國政府“事無大小，必須各官合議，然後准行。即不咸允，亦須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後可行”；各省官員，“由本省之民選擇公舉”，美國總統（大酋）廢除世襲，四年一任，由民公舉，“可不謂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可不謂周乎”^⑦！魏源贊嘆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國家制度既“公”且“周”，在《海國圖志》後叙中稱頌：“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還把“不設君位”的瑞士，贊揚為“西土之桃花源”^⑧。

儘管魏源對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模糊好感和朦朧向往，帶有追思三代遺風的復古情懷，但是他畢竟勇敢地沖破了君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觀念和夷夏大防的祖訓。《海國圖志》不僅承認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物質文化比中國高明得多，連它們的國家制度和政治運作，也有值得稱頌之處，從而邁出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可貴的一步。應該說，魏源是不顧“天朝上國”尊嚴，用肯定的態度向中國人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第

產階級國家制度和民主政治。他說：在美國，“邦長五年一任，限以俸祿，任滿則養尊處優，各省再舉。有事則各省總目公議，呈明決斷。取士、立官、補缺及議大事，則限月日置一大櫃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寫票公舉，置于櫃內，以多人舉者為賢能也，以多議是者為公也。”^⑩但是，洪仁玕對涉及太平天國根本體制的敏感問題，僅作介紹而不加評論，更不建議天王採納。洪秀全在《資政新篇》上寫了好多“此策是也”、“欽定此策是也”之類的批語，但在觸及自己皇權主義統治地位的這一條上不作任何表態。原因很明顯，上層建築畢竟是經濟基礎的反映，農民領袖不可能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接受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制度和民主觀念。需要說明的是，洪仁玕是一名在英國殖民地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有機會接觸過不少西歐、北美的傳教士，瞭解西方資產階級國家許多具體情況的知識分子。是太平天國唯一具有近代頭腦和世界眼光的高級官員。因而，不是農民階級的經濟地位和農民意識，而是西方資產階級的進步影響和他所受的近代教育，驅使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向農民領袖洪秀全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和民主政治。

二 西方國家學說的最初介紹和變革君主專制的 輿論準備(19世紀70年代——甲午戰爭前)

19世紀60年代初，馮桂芬在將中國和西方各國進行比較時，曾經明確地指出，中國“君民不隔不如夷”^⑪；但他當時并没

有提到建立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問題。70年代,中國資產階級早期改良派提出了振興商務和發展民族資本的要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遭到的各種挫折、磨難和痛苦,使他們逐漸意識到:不改變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中國就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因此從這時起,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改革封建專制制度、實行君民共主即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微弱呼聲。

這個時期,對西方國家學說的最初介紹主要來自三個渠道:傳教士、曾經出過國的早期改良派和開明的出使官員。

從我們見到的史料看,70年代首先將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和政治學說大致介紹給中國的,是基督教廣學會在上海辦的《萬國公報》。1875年6月,《萬國公報》在一篇題為《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的文章中說到:泰西各國,“治國之權,屬之于民”,這是泰西立國“最關緊要”的“不拔之基”;而“推原其故,緣均是人也”。只要是人,生來就是平等的,“寒必需衣,饑必需食,溫飽之情,無貴賤一也。不觀人之耳目手足乎?或為君,或為臣,耳目手足無所加焉;降而至于小民,耳目手足無所損焉。因恍然于治國之法,亦當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文章還準確地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理論,把行政、司法、立法三權譯為“行權”、“掌律”、“議法”,指出西方各國政治制度形式上雖有差別,但實施三權分立則一。文章更將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稱為“民主國”和“寬政之國”,介紹西方“議法之員,分言之為上、下兩院,合言之即為公議堂”,贊頌資產階級代議政體是“有利而不相悖,有益而不相害”的國家制度^⑫。在中國近代國家學說發展史上,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重要文獻,它不僅準確地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制度,而且觸及了主宰議會制度的民主

思想。後來，傅蘭雅口述、應祖錫筆述的《佐治芻言》，更詳細地闡述了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的思想。《萬國公法》、《萬國史記》之類的譯書，也都不同程度地介紹了西方的國家學說。此其一。

早期改良派中比較詳細地向中國人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是王韜。1874年，他在香港主編《循環日報》，宣傳變法自強，這些文章後來被編入《弢園文錄外編》。王韜把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分爲“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和“君民共主之國”三種類型并作了比較。他認爲：“君爲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爲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⑬，是最好的國家制度。他還通過對沙皇君主專制的鄙棄，曲折地表現了對清朝君主專制的厭惡；通過對英國君主立憲國家那種“君民上下互相聯絡”的贊美，期望中國也能“聞風向慕”。

馬建忠曾長期在李鴻章手下當幕僚，後來被送往法國留學，系統學習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學說。他不但將西方的國家分爲君主國、民主國和君民共主之國三類，介紹了“定法、執行、審法”（即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認爲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由于實行三權分立制，“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燦然可觀”，贊揚民主政治使“人人有自主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而且還敏銳地觀察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虛偽性和弊病，批評英國首相操縱政權，“上下議院徒托空談”，美國總統雖“由民自舉”，但“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⑭。此其二。

開明的出使官員，如張德彝、郭嵩燾以及薛福成、黃遵憲等，在他們的論著、日記、書牘、游記甚至奏議中，對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國家制度，也作了介紹和贊美。例如，同治五年（1866

年)張德彝記英國議會說:“凡有國政會議,其可否悉以衆論面決。其極坐之三大臣,有議論不足服衆者,許公舉以罷其職。”^⑮ 70年代,郭嵩燾在《條議海防事宜》中奏陳:“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⑯出使四國大臣薛福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到:“地球萬國內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民主之國也,其政權全在議院”;“君民共主之國也,其政權亦在議院”。“法國前稱皇帝,而今改爲民主,始稍安謐。”在他看來,“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爲最良”^⑰。此其三。

王韜、馬建忠、郭嵩燾等人,雖然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制度與國家學說,間接表達了對君主專制的鄙棄,但也沒有直截了當地提出要在中國變革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讓資產階級參預政權的要求。1884年中法戰爭的失敗,以嚴酷的事實評估了洋務派的所謂自強新政:船也有了,炮也有了,然而中國並沒有走進凱旋門,而是落得一個“不敗而敗”的結局。舉國悲憤,腐朽昏庸的封建政治體制,不能不受到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的懷疑和沖擊。

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早期改良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鄭觀應,曾任兩江總督并在中法戰爭受挫的淮軍將領張樹聲(靖達),都向朝廷提出了開議院的救國主張。鄭觀應在中法戰爭期間上書清廷,要求開議院,被斥爲“狂妄”,不予採納。此後他不斷著書立說,傳播資產階級民權思想,歌頌西方議院制度,極力鼓吹:“欲張國勢,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設議院。”^⑱并以日本“勃然興起”的實例,強調中國必須儘快實行議院制。封疆大吏張樹聲則在1884年10月口授的一份

《遺摺》中提出：“西人立國，具有本末。……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綫，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①⑨}

在皇權至高無上的中國，敢于對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學說和民權思想作最初介紹，敢于直接向清王朝要求建立議會制度，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是對民主革命的貢獻，是人們變革政治制度和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一次認識上的飛躍。資產階級早期改良派志士仁人的功績在于，他們為行將到來的變法維新作了思想上的啓蒙和輿論上的準備。過程中，傳教士的報紙和宣傳，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他們在有意無意之中，把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原素，輸導給了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人。

三 西方國家學說的廣泛傳播和建立資產階級君主

立憲國的勇敢嘗試(甲午戰後——20世紀初)

從甲午戰後到戊戌變法，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在政治上屬於同一營壘——資產階級維新派，但在近代國家學說發展史上，他們的貢獻則各有側重：康、梁、譚的精力主要用在變革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和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度方面；嚴復的功績則在從理論上、思想觀念上，對西方國家學說作了比

較經典的介紹和深入的探討。

康有為領導維新變法，他對西方國家學說的理論宣傳和建立君主立憲國家的政治實踐，人們耳熟能詳，恕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的國家學說中，傳統文化的痕迹比較深。例如，《公車上書》采用的是漢制“議郎”之名，而議郎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國國會或議院的中國版。公車上書建議：每十萬戶公舉議郎一名，“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所有人員，歲一更換”，其職責是“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于太和門，三占從二，下部施行”，以求得“君民同體”、“休戚與共”^{②0}。這樣，早期改良派關於設立議院、君民共主的構想，就被康有為具體化為可以運作的步驟了。又如，“公羊三世說”原只是漢代何休《春秋公羊解詁》中提出的一種關於由亂到治的朦朧的歷史進化觀念。康有為卻從微言中挖出了大義。他先在《禮運注》中把公羊三世說和中國古代典籍《禮記·禮運篇》所講的大同、小康加以比附，認為公羊三世說是孔子製定的三個循序漸進的歷史階段，即：由據亂世進化到昇平世（小康世），再由昇平世進化到太平世（大同世）。接着又在《論語注》中，用資產階級歷史進化論的觀點，將君主——立憲——共和，與公羊三世說作簡單比附。他說：“人道進化，皆有定位，……由君主而漸為立憲，由立憲而漸為共和。”“蓋自據亂進為昇平，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②1}。

梁啟超和他的老師不盡相同，他將康有為托古改制的公羊三世說與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直接挂起鉤來，演化為宣傳資產階級民權思想的“三世六別”說，斷言整個世界的歷史潮流，是由多君為政之世，向一君為政之世，再向民為政之世發展，

民政必然取代君政^②。以公羊三世說與三世六別說相比，顯然，前者的封建傳統烙印更深，後者的資產階級色彩更濃。

對於戊戌前梁啟超的國家學說，人們很熟悉；對於 1903 年至辛亥革命前梁啟超與革命派論戰時期的“開明專制論”和政聞社時期的立憲學說，人們也很注意。但是，對戊戌政變後至 1903 年期間，梁啟超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發表的大量研究與傳播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學說的論文著作，人們卻注意不夠。這一時期，梁啟超不僅批判封建專制主義，闡發資產階級國家學說，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度下的三權分立，強調三權分立的積極作用在於：一可使權力互相牽制，以避免專制，二可使權力不相侵越，以避免相互掣肘或推諉^③；而且按照他所理解的盧梭、孟德斯鳩以及伯倫知理、波倫哈克的國家學說，結合他所認識的中國社會歷史，對國家起源論、國家主權論、國家要素論、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的抉擇等問題，闡發了自己的見解。

梁啟超認為：人，一方面是“獨立自營之個人”，一方面是“通力合作之群體”^④；從後一個特性出發，就會引出群體內部的糾紛和群體外部的侵擾。爲了處理內外矛盾，“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急難之際，群策群力，捍城禦侮”，於是政府與國家產生^⑤。這種國家起源論雖有缺陷，但它至少不是從“天意”中引出結論，因而也就使“君權神授”論站不住腳跟。

1900 年 2 月，梁啟超還用三要素論來解釋國家的構成。他說：“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⑥這種國家要素論不僅排除了君主是國家唯一屬性的傳統觀念，

直接否定了“朕即國家”的封建國家觀，而且把主權列為要素，幫助中國人民深化了捍衛國家主權的理性認識。

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的關係如何處理？梁啟超認為：國家是人民公產，國家機構是為人民辦事的，“以常理言，則各私人之幸福與國家之幸福，常相麗而無須臾離，故民富則國富，民智則國文，民勇則國強”^{②7}，國家的目的和人民的利益在本質上理應一致。但是，國家根本利益和人民暫時利益又往往處于矛盾之中。由于個人離開社會和國家難以存在，“國亡而人權亡”，所以他主張：“以政府對人民之權限為主眼，以人民對政府之權限為附庸”^{②8}，在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的抉擇上，應該以國家主權為主，而以人民主權為輔。封建主義的國家學說，把君主權力看得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主權論”，回避了國家的階級性，弊病顯而易見，後來法西斯主義甚至抬出“國家至上”而抹煞人民主權。但在反對“君權至上”這一點上，梁啟超的主張還是起了進步作用。

梁啟超在熱情宣傳天賦人權論，頌揚“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②9}的同時，着重闡發了資產階級民權學說中義務與權利對等的思想。他說：“義務與權利對待者也。人人生而有應得之權利，即人人生而有應盡之義務，二者其量適相均。”^{③0}企求絕對自由、絕對民主，妄想無義務之權利，猶如“磨磚以求鏡，炊沙以求飯”。至于梁啟超著《新民說》，由熱衷于政體轉型到注重國民文化心理結構的重建和民族素質的提高，強調新國必先新民，“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③1}。更是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對國家學說的深層思考^{③2}。

從觀念形態考察，嚴復對國家學說的精辟論述，尤其發人深思。

甲午戰敗後，嚴復從救亡圖存、自強保種出發，在《闢韓》一文中，以社會契約論為武器，將韓愈《原道》篇作為靶子，對封建主義的君主專制論和君權神授論作了嚴厲批判。他認為，君權絕非“天之意”、“道之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人們本來是平等的，不需要國君來統治自己，只是因為人民中間有各種“相欺相奪”的糾紛，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而人民自己又忙于“耕織工賈”，所以才“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為之君”，以維護民的利益。正由于此，嚴復一反“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傳統觀念，強調指出：“君不能為民鋤其強梗、防其患害則廢。”“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只有“民”，才是“天下的真主”^③。在另一篇論文中，嚴復着意倡導尊民叛君，深刻地揭示：“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④，進一步劃清了封建君權與資產階級民權的界限。嚴復還熱情宣傳天賦人權論，強調“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主張“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怒斥侵人自由即為“逆天理，賊人道”^⑤。在這方面，嚴復確實發揮了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作用。

在體用觀，即什麼是西方社會的“體”或什麼是資本主義立國之本的問題上，嚴復的認識比康梁更為鞭闢入裏。19世紀末，大部分先進的中國人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包括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是西方社會的“體”。這個認識已經突破了器物層次的表面觀察，深入到了制度層次，不僅是知識分子在憂患意識驅導下對改革前途的合理思考，而且符合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要